

<<跌荡一百年（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跌荡一百年（上）>>

13位ISBN编号：9787508613420

10位ISBN编号：7508613422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中信出版社

作者：吴晓波

页数：29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跌宕一百年(上)>>

前言

【题记】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

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

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日，在漫天烟花中，改定《序言》。

序言：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瑞典诗人托？

特朗斯特罗莫【一】1979年9月的一天，法国学者玛丽？

白吉尔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大楼里，等待一个重要官员的接见。

白吉尔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曾参与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写作。

她后来记录那次会见场面时写道，“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后面跟着五六个随行人员，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

他身穿一件直领、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和步姿和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

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百达翡丽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

”跟白吉尔见面的这位官员是荣毅仁。

他是晚清和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荣德生与他的兄长荣宗敬曾经控制了全国将近一半的面粉和棉纺工厂，被称为是“中国的洛克菲勒”。

仅仅几年前，荣毅仁还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全国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和打扫所有厕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常遭批斗，食指被红卫兵打断。

而1978年2月，他被邓小平解救复出，现在，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在中信公司里，还聚集了众多的、年过花甲的上海籍资本家。

“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漩涡之中。

”白吉尔在后来出版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 - 1937年）》一书中写道，“我由衷地感到，若以流行的革命史研究观念出发，研究中国商业阶层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企业家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崛起，仅仅构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简单的历史摸索过程。

”然而，随着她对中国观察的深入，特别是对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变革的零距离审视，历史突然呈现出它另外的面孔。

“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企业家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并将长期以来教条地把革命与现代化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加以澄清。

”那么，在更为悠长的历史跨度中，我们——包括象白吉尔这样的国际学者——是否有可能对一个被长期漠视甚至妖魔化的阶层进行新的观察？

白吉尔式的好奇，并不是惟一的。

2004年的深秋，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来杭州，约我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这里曾经是林彪的“行宫”，现在则成了企业家们最爱居停的清幽场所。

王石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

”我一时语塞。

显然，疑问从另外一个地方浮起。

也就在与王石闲谈的同时，我已经开始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 - 2008》的写作，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的调研与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此类问题所困扰——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

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

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强烈的家国情结、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

<<跌荡一百年(上)>>

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气质，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

另外一个更具穿透力的问题是，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因写作《万历十五年》而出名的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

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

”而1932年就到过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则在《剑桥中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

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他从1600年写到1989年，整整三百八十九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

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

这是一些十分暧昧的、具有冲突和互补性的结论，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然而，这显然是一个不公平的景象。

正是为了解答上述的这些问题，让我在完成了《激荡三十年》的写作后，鼓足勇气，溯源再上，开始重新梳理1870到1970年代的中国百年企业史。

史海茫茫，我出发去打捞沉睡在水底的记忆碎片。

因受到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影响，中国企业史在传承上支离破碎，几无传统可言，它好象一张被一次次粗暴撕裂的地图，一切都混乱不堪，某些片幅遗失了，显得残缺不全。

【二】仅仅过去了一百年，我已经很难从实物上目睹到当年的光荣。

曾国藩当年的安庆兵工厂已经无迹可寻；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现在只剩下一个游客稀少的船政博物馆；张之洞的“亚洲最大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只留下一堆供人追念的黑旧机床；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总部如今是一个时尚的休闲会所；当年的“机器之母”江南制造总局正在大拆迁，这里将在两年后成为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展区；在梁启超赞许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的南通，张謇和他的大生集团都已成为历史烟云中的传说，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他与“绣娘”沈寿的忘年恋情；在无锡，荣家兄弟的梅园花枝烂漫，他们的纺织厂和面粉厂成了需要保护的“工业遗址”；在集美小镇，陈嘉庚的故事更象海平线尽头的那一个飘渺的风帆远影。

还有人记得范旭东吗？

正是因为他研制出了精盐，让中国人摆脱了“食土民族”的耻辱；还有人记得虞洽卿吗？

正是因为他的“沉船”，打破了日本军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还有人记得穆藕初吗？

他不仅是昆曲留存的恩人，更是全中国最懂棉花的人；还有人记得张公权吗？

他在27岁那年就领导了中国最大的银行；还有人记得郑观应吗？

他不仅写过《盛世危言》，还是一个被长期蔑视的买办阶层的代表；还有人记得卢作孚吗？

那个瘦小寡言却有着猛虎般个性的“中国船王”。

甚至，我们该怎么评价盛宣怀、胡雪岩、周学熙和宋子文？

他们仅仅是一群鼻尖上堆着一团白灰的恶商丑辈吗？

“化石”残存，商脉已断，一部企业史如同堰塞多年的大运河，我们能否清淤接续？

我还试图在大历史的转折时刻里，寻找到企业家们的身影和声音。

在国贫民穷的时刻，是怎样的资本和人才组合启动了“洋务运动”？

在慈禧出逃、八国联军蹂躏北京的时候，南方的商业繁荣是靠谁保全的？

当立宪浪潮成为全民共识的时候，谁是最积极的推动者？

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谁保卫了市井的稳定？

在五四运动的口号声里，谁是广场背后的支持者？

在军阀割据的年代，谁一度管理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在日本军队悍然侵华的时候，又是谁保住了“陪都”重庆的安全和转移了国家的最后一口元气？

<<跌荡一百年(上)>>

我想，这真是一个需要修正的历史事实。

中国工商文明的重建，是一个百年命题。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场战争不是中国落后的开始，而是结果，是民族觉醒、觉悟和崛起的开始。

从那时至今，数代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中国的伟大复兴。

正如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所说的，“兵战”与“商战”是中国复兴的两大主题，而後者的主角就是企业家阶层。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对日抗战，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开放，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的活跃的身影。而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遗忘。

企业家阶层从来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甚至他们的职业属性使得他们在很多时候与激进主义背道而驰。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中国的进步史上，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过去百年间，国家与资本、政府与企业家阶层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很独特的命题。

企业家阶层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的微妙和暧昧。

在这部著作中，我得到了三个基本的结论：一，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分工与冲突，构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所有表象。

在这其间，企业家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时刻，他们甚至主导过历史的演进，在很多企业家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气质比很多知识分子、政客要显得更加的理性和真实。

二，在过去的130年间，也就是从晚清洋务运动至今，中国商业世界的逻辑竟是如此惊人地一致。

作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延续了2000年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

在当今中国经济界，一个经常被讨论却难有解答的课题是，国营垄断资本的日渐庞大，将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未来很难被准确的预测，不过，历史却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某些启示。

一个很少被人观察到的历史事实是，在过去的130年里，中央政权曾经因同样的问题而遭到过致命的挑战。

在晚清末年，正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

而在1930年代，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则显然对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

这一历史的教训值得当世的人们予以警醒。

三，在百年的中国变革史上，企业家阶层曾经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中国所出现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浪潮，恰恰来源于中国企业家阶层以往获得并留存至今的经验，正是这些经验使得企业家阶层得以幸存。

它们虽然不可能占据历史的支配地位，却可以使得历史的发展更加充满活力，更加生机盎然。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官吏和精英阶层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重建与民族的复兴，而悲剧性的是，每隔三十到四十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外乱或内患所打断，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史成为了一部缺乏传承感的历史。

对于中国商业进步的缓慢，不同领域的专家已经给出了无数个答案，在本书中，我们仅从企业史的视角来给予观察。

我们看到的是三个景象，一是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

让人叹息的是，在其后的多次经济变革运动中，这三个命题都由幽灵般地随影而至，无法摆脱。

即便到了百年后的1978年，当中国再度开始经济变革的时候，这三大命题仍然在困扰着这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没有跳出一个成长的逻辑圈。

<<跌荡一百年(上)>>

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

让人高兴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在三十年的和平崛起中，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饥荒、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绝大多数的民众是这场改革的获益者，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未来三十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大范围的、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

这是本书企图达成的一个目的：通过对企业家阶层的历史作用的还原、分析与辩驳，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

【三】其实，在欧美国家，对企业家作用的认知也是滞后的。

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

D？

钱德勒在撰写美国企业史时就曾经说过：“历史学家早就被企业家吸引，却甚少注意这些企业家所创立的机构以及他们管理方式和所实现的功能。与此相反，他们一直在争论这些创业的先辈是强盗企业家还是工业政治家，即是好人还是坏人。

”在中国，企业家的角色更是尴尬而暧昧。

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男三号”。

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当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这是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

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史学家阶层什么都没有。

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上，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地寂寞闪光。

在乱世之中，企业家似乎总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人。

他们在混乱中诞生，在惊悚中长大，对成长缺乏经验，发育一次次被打断，从来没有轻松自如的时刻，甚至，好象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成长礼”。

这个阶层生来没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们过于冷静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时刻会被认定为懦弱，他们天生是理性逻辑的信徒，这在信仰革命的时代显得十分可笑，他们对自我财富的捍卫，更是看上去有点可恶。

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让人砰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象一枚硬币的A面或B面。

他们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欢喜。

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

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

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

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想在这部著作中证明，过去百年间，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

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

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

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

他们曾经扮演过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们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有机会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

<<跌荡一百年（上）>>

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带入了泥潭。

他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强大的政府机器的关系。

可悲的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的身影总是被掩盖甚至丑化，他们好象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

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伴生现象，或者说，它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

这一特征在本书中将呈现得更加清晰。

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下。

我们在观察所有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

这样的观察不得不让我们对企业家阶层——特别是基础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在中国进步中的角色进行新的审视。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业家阶层再次成为一个不知如何自处的群体。

几乎所有的、参与救援的人们都成为了“英雄”，他们包括官员、军人、媒体人士、志愿者、艺人、向捐款箱投钱的乞丐以及每一个对着镜头流泪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独受到攻击和谴责的，是企业家

。尽管，从数据上看，他们的捐款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尽管很多企业家也赶到了现场或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不宽恕”在这场地震中达到了极致。

甚至很少有人愿意为他们做辩护，这会被视为有钱人的走狗和同路人。

这种景象的出现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家在社会变革中的所承担的角色是多么的尴尬。

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

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它们如同地火一样地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的伤害。

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 - 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爆发，企业家几乎扮演的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

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无庸质疑的、是痛快淋漓的。

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

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

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我们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感知到，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的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

【四】在2004年开始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曾经引用法国作家罗曼？

罗兰的名言写了一篇序言《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历史的本质仍然迷惑不解，不过，在研究心态上却好象平和了很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以一种更为放松的态度看待历史，置身于历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给这个世界留下印记，但同时又不要笃信。

这样，我才能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

我还很喜欢沃尔特？

李普曼——他是最心仪的美国专栏作家——的说法：“新闻不能告诉人们怎么思考，只能告诉人们思考什么。

”其实，历史也是一样。

在这个日渐熟悉的领地里，我每每如履薄冰。

<<跌荡一百年（上）>>

我常常为一个细节而苦恼数日，却也会为一个意外的获得而惊喜若狂。

我常常感奋于那些激越的生命，也为他们在历史大雾中的烟灭而黯然神伤。

从本质上来讲，这场已经耗费了我五年生命的、漫长的写作计划，只是为了和遗忘对抗。

逝者如锈迹斑斑的沉钟，非虔诚而用力的击打不再苏醒。

很多历史的真相，唯有在一定距离的后望中，才会显得略为清晰，这是人类认知能力的缺陷，也是人性悲哀的组成部分。

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中国的商业历史总是不押韵的，粗糙而缺乏修饰，象极了我们每一个坎坷而迷茫的人生。

确切的说，后来者永远无法得到历史的真实，我们只是在无限的接近。

就好象我此次试图厘清历史的每一条纹理和逻辑一样，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努力都会被认为是荒谬和徒劳的。

写作是如此的枯燥。

那是一些沉默而微光闪现的夜晚。

在疲倦的时候，我会站在阳台前，静视运河的沉寞流淌，仰望若隐若现、神秘的江南星空。

我觉得有一些眼睛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注视着我。

在这时，我会想起诗人北岛的《青灯》：“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

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

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

<<跌荡一百年（上）>>

内容概要

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再写中国企业100年。

了解中国百年崛起，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

此为上卷，叙述1870~1937年的中国企业变革。

作者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

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

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

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英雄主义的魅力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跌宕一百年（上）>>

作者简介

吴晓波，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

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激荡三十年》等。

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激荡三十年》荣获“和讯年度财经图书大奖”、中国图书评论协会“年度十大图书”等奖项。

<<跌荡一百年（上）>>

书籍目录

前言：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第一部 1870 - 1910：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 1870年：未死将生的时刻 【企业史人物】太保赫德 1875年：买办救国 【企业史人物】买办世家 1884年：盛宣怀夺权 1894年：状元办厂 【企业史人物】一代“商父” 1900年：国变中的商人 【企业史人物】北方一周 1905年：立宪急先锋第二部 1911 - 1927：惟一的“黄金年代” 1911年：在革命的炮火中 【企业史人物】百货四子 1915年：作为抵抗的商业 1919 广场背后的人 1924 工商决裂 1927 悲剧之月 【企业史人物】菊生印书第三部 1928 ~ 1937 国家主义的回归 1929 商人的抗争 1932 救亡的经济 【企业史人物】费的眼睛 1935 大收编 【企业史人物】嘉庚助学 1937 沉船与拯救 【企业史人物】南洋兄弟致谢人物索引

<<跌荡一百年(上)>>

章节摘录

第一部 1870 - 1910：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
1870年：未死将生的时刻
公元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隶总督衙门的后花园。

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族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困坐愁城。

在过去的16年里，曾国藩靠团练湘军起家，“清剿”了南方的太平天国（1851-1864），将一个看上去即将覆灭的帝国重新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同治中兴”。

上年，他由两江总督调任更为重要的直隶总督，可谓圣眷正隆。

但是，进入中央枢纽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根烂叶败，国政匡废，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

他对赵烈文说，当今之世已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吾日夜望死，忧见宗柘之陨”。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到处充满了帝国斜阳的忧伤。

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尽管它也时常被战争、饥荒、瘟疫和暴政所困扰，不过，却始终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从容。

辽阔的疆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让它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自我愈合能力，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恐慌、破败和孤立。

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次年，英国舰队攻击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溃败。

中英开战之时，国人对英人了解之偏缺让人咂舌。

中方主将林则徐认定英国士兵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因此只长于海战，一登岸来就“一仆不能复起”，任人宰割。

他在1839年9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代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林大人已是举国最“开化”的官员，以此“知彼”，焉能不败？

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在一艘叫做“皋华丽”号的英舰上签署，清廷割让香港、开放通商口岸并赔偿巨款。

从这个原本称为“万年条约”的不平等条约开始，中国步入了屈辱的100年。

在一个陌生的、冉冉升起的外域文明面前，一向自大的帝国突然变得无比的惊惶和不自信。

1872年3月20日，曾国藩在抑郁中病逝。

半年后的9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旧金山来电”，报道第一批中国政府派送的留学生坐船到了美国。

新闻称：“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到美国访问过的中国人都好看得多。

有三名身为中国官员的教师陪同他们。

朝廷拨出100万美元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

”这条快电有两个小小的错误，首先，30名俊秀的少年都是男孩，或许因为他们留着辫子，所以实在很难进行辨认。

其次，他们也不是经过精心选拔的、最优秀的中国少年，30人中有24个来自广东，其中更有多名都来自香山乡村。

事实上，负责选拔事务的官员根本找不到愿意让孩子远渡重洋去留学的富足家庭，只好在南方勉强凑到了一些贫穷子弟。

临行之前，所有孩子的父亲都要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押签字。

在这些学生中，日后最出名的是修建了京张铁路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开放事件，就好比整整106年后，当再度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国也在第一时间向美国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曾国藩没有亲眼看到帝国的崩溃。

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才智卓越的湖南人一直在做一件比击溃太平天国更具有长远意义的事情——他和他的同党们试图让暮霭中的国家重新振奋起来。

<<跌荡一百年(上)>>

向美国委派留学生就是他临终前最后批准的计划之一。

这是一项更为庞大的复兴工程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工程日后被称为“洋务运动”，它便是中国近代企业的起源。

洋务运动的启灶，先是与镇压各地民变的军事活动有关。

早在1855年，起兵不久的曾国藩就在江西设立了小型兵工厂，1861年，又在安徽安庆建了兵工厂和船坞。

1862年，他从官库中调出6.8万两现银交给35岁的容闳，派遣他前往美国购买建造兵工厂所需设备。容闳出生于澳门附近的贫穷家庭，少年时被教会学校送进著名的耶鲁大学读书，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校的中国人。

他赴美期间途经正在修建中的苏伊士大运河，预感世界将被打通。

1864年5月，曾国藩最得力的助手、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说：“鸿蕈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

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此议不但提出要学习西方，还试图修改千年科举制度的取士标准，在当时十分惊世骇俗。

1865年，中国第一艘实用蒸汽船“黄鹄”号建造成功。

同年，苏淞太道道员丁日昌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李鸿章又将丁日昌原来开办的炮局及总兵韩殿甲的炮局并入，并新配备了容闳在美国购买的一批机器，曾、李两人由此正式奏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在9月20日写了一份很长的奏折《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详细说明开办此厂的重要性。

他认为“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而且现在制造的机器是为军事所用，日后一定运用普及，“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

他甚至预言道，“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江南制造总局一开始主要生产一些小型的装甲快艇、步枪、火炮和子弹。

1867年5月，曾国藩奏请朝廷提留部分海关税款建造大型舰船。

第二年8月，工厂生产出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木壳轮船“恬吉”舰。

轮船下海时，上海万人空巷，争相观看，欢呼雀跃。

曾国藩高兴地在试航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国初造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

”其后五年，“操江”、“测海”、“威靖”和“镇安”等军舰相继造成，最大的“镇安”舰排水量达2800吨，1800马力，安装有20门火炮，已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

江南制造总局堪称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是晚清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

它从生产枪炮弹药开始，日渐发展成为修造船舰、炼钢炼铁、机械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新式企业。

它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炼钢炉，生产了大批车床、刨床、钻床、锯床和起重机、抽水机、汽炉机等，成为中国机械制造产业的开端，有“机器母厂”之称。

它后来更名为江南造船厂，一直是最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

到2010年，位于黄浦江畔的工厂原址将成为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展区，百年复兴梦想，居然在此巧合际会。

就在江南制造总局开办的同时，另一个地方大员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建了福建船政局，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楨任总理船政大臣。

它造出了第一艘铁甲军舰，组建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福建南洋水师。

左、沈两人还创办了培养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新式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它以中文、法文双语开课，所用教材均是来自欧洲的原版教科书。

优秀的学生被选拔到英国和法国的大学深造，他们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中国海军的骨干力量。

这些早期工厂尽管对增强国力作用十分有限，但却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洋务运动是一次留着“辫子”的改革。

后世史学家常常谓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

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观察，就在曾国藩等人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后来成为全

<<跌荡一百年（上）>>

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相继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

在某种意义上，日后百年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美国在1865年结束了南北内战，林肯总统虽然解放了黑奴，但种族隔离仍然持续，尤其在南部，黑人不能入读白人学校，不能在招待白人的餐厅进食，不能与白人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或必须让座给白人。

在1860年前后，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全美超过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个，钢铁产量还不足100万吨，欧洲的报纸直接将之比喻为“跟在英、法后面的小兄弟”。

1865年，后来成为美国首富的安德鲁·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与人合伙创办了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

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向清朝廷递交《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1871年，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

而当时在中国，“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正处巅峰，其支店达20多处，遍布大江南北，资金2000余万两，田地万亩。

胡雪岩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从事药品商贸，俨然一个混业经营的大企业。

也是在这一时期，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刚刚诞生。

1870年，以“埃姆斯电报”事件为导火索，普法战争爆发。

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指挥下，普军大获全胜。

普鲁士军队开进巴黎城，在凡尔赛宫宣布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皇帝。

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感慨将更深一层。

就当曾国藩在保定府日夜望死的前一年，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国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1868年1月3日，一个叫西乡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从鹿儿岛北上，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迎回天皇，从此拉开明治维新的帷幕。

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个很可以参照的对象。

在过去的150年间，这两个东方国家在三个重大的时间点上出现过惊人的类比点。

<<跌宕一百年（上）>>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是19世纪以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

吴晓波像一个勤奋的论文写作者一样，从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描绘了中国崛起的秘密。

——英国《金融时报》关于中国企业种种不可思议的事迹，散布在漫长的历史中。

吴晓波花费数年时间，将它们一一拾起，把一段由感性、零碎、个人观察组成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化的描述，在浩如烟海的陈旧信息中，梳理出了历史的脉络。

——《南方周末》在中国诡谲多变的商场里，企业起起落落乃是常态，能经得起时间淬炼的企业必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外人对于中国企业的兴衰常有雾里看花之感。

吴晓波的企业史作品无疑替我们开启了一扇门，以一个又一个商业（公司）发展与挣扎的细节，道尽了中国企业所拥有的无限契机，以及在发展道路上的崎岖。

——台湾《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书市上从来不乏企业的传记，但它们总过于和写作对象接近，公正而审视的企业史著作依然匮乏。

吴晓波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期待，他笔下的企业史能让读者获得一种冷静的激情。

——《21世纪经济报道》吴晓波把目光聚集在方兴未艾的企业史上，他笔下寂寞千年的男主角——企业家粉墨登场后，企业史的概念得到了市场认可，而他的作品也成为了草莽英雄传。

——《中国经营报》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分析，吴晓波掌握了一些切实的研究成果。

也许再过数年，他能写就类似于《追求卓越》、《从优秀到卓越》、《基业长青》的中国版商业“本纪”。

——《第一财经日报》吴晓波以一种好奇者的单纯扑入中国历史变革的复杂历程中，适时结合当年的世界“风云”，面对中国遭遇的各种“气候”，把握在各色“风云”和“气候”当中出现的特定情境。

他极具人文思辨，往往能回归人性本源进行解构，大浪淘沙，尽收眼底，兴衰成败，皆入囊中。

——《新京报》

<<跌荡一百年(上)>>

编辑推荐

《跌荡一百年(上)》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1、作者吴晓波是著名畅销书作家，他的《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跌荡一百年(上)》”之一，销量应有50万册以上。

《激荡三十年》销量也在30万册以上。

2、作者对这一题材的驾御能力非常强，人物、事件、环境都不是孤立的，他在查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将整个历史生动地再现出来，可读性非常强。

3、《跌荡一百年》为《激荡三十年》姊妹篇，作者溯流而上，再写中国企业100年。了解中国百年崛起，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

<<跌荡一百年（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